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程源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关键词] 宋代 《左传》学 经与史 二重路径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24)01-0001-10

一、问题的提出

《左传》正式进入经学研究始自刘歆。据《汉书》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①刘歆治《左传》的著作虽已不存,但他为《左传》争立学官,应该主要是借助《公羊传》和《穀梁传》来论证其大义的。^②汉代由刘歆而始的今古文之争,直到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才告一段落。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古文经的《左传》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古文家贾逵等人进一步发扬《左传》学,汉章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③据《后汉书》本传记载,贾逵著有《左氏条例》21篇。以古文为宗兼采今文的郑玄,为批驳今文家何休《左氏膏肓》而作《箴膏肓》,进一步申明《左传》古文之义,“自是《左氏》大兴”。^④在东汉今古文之争的过程中,《左传》逐步取代《公》《穀》二传的学术地位,同时也部分汲取了《公》《穀》之义。

[收稿日期] 2023-11-12

[作者简介] 程源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项目“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项目编号:22VLS006)阶段性成果。

① 《汉书》卷36,《刘歆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

② 如《左传》庄公三十年“齐人降鄆”,《正义》引《释例》曰:“刘、贾(按:刘歆、贾逵)依二传,以为鄆,纪之遗邑。”载《春秋左传正义》卷10,《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68页。

③ 《后汉书》卷36,《贾逵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6页。

④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64页。

西晋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把《左传》的经学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杜预也因此成为“《左氏》功臣”^①。杜预吸收了服虔、王肃等前人的成果,集合众家之解以成此书。其主要创见有三:一是把经、传合为一书。在杜预之前,“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名卷”^②,《集解》则“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③,开创了注解的新体例,为后世解经所沿用。二是对《左传》的“例”进行系统发明与阐述。杜预认为《左传》解《春秋》采用三种方式:“正例”,以“五十凡”为代表,指的是《左传》中的五十句带有“凡”的句子,认为“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④;“变例”,指的是《左传》中“书”“不书”“故书”“先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这是孔子确定的褒贬之义;“非例”,指的是前两例之外大量的经传只是备述史事本末,自然没有“例”可言。三是坚持“经承旧史,史承赴告”的观点。所谓“经承旧史”,乃认为《鲁春秋》中有大量“周之旧典礼经”,孔子只是“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⑤;所谓“从赴告”,是说除鲁国之外的其他各国史事,得到“赴告”则书,否则不书,所谓“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从史的角度来认识经传,避免了今文经学很多牵强附会的地方,更为平实可信。

唐初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其《春秋正义》定杜注于一尊。由于实行“疏不破注”的原则,在杜注和孔疏的加持下,人们多将《春秋》与《左传》等同起来,《左传》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随着中唐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开启“疑古惑经”之风,他们突破了以往专守一传的传统,以《春秋》为本,对三传优劣去取进行综合考察。在这种治学方法下,《左传》的地位开始受到了动摇,如赵匡即依据《论语》所言“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认定此“左邱明”应是孔子以前之人,故而左丘明作《左传》不成立。^⑥ 学者认为,“从今日所掌握的史料看,应该说这是自汉以来第一次有人公开、明确地对《左传》的作者提出怀疑。此后宋代的学者沿着赵氏的思路不断地提出新的疑点,《左传》为左丘明所作之说遂发生动摇。”^⑦对《左传》作者的怀疑,使得孔子和左氏的关系不再紧密,进而动摇了《左传》对《春秋》注解的权威性,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

随着宋代理学的兴起,在解经上突破家法,直阐义理,从而使得以史事解经的《左传》学的地位进一步下降^⑧,与此同时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充分认可。一些学者视《左传》为史学著作,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通过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从而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总体来看,宋代《左传》学交织着旧说与新学、经学与史学,为之后的《左传》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在《左传》学史上完成了汉宋学术范式的转换。从学术界已有研究来看,人们主要是在《春秋》学兴盛的大背景下以经传关系为重点对《左传》作出考察,直接对《左传》学本身进行研究者较少。^⑨ 至于对宋代《左传》学之于史学的影响,虽然有所关注,但主要局限于史书体裁影响上,缺乏

① 阮元等:《畴人传汇编》卷52,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638页。

②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15,《春秋左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69页。

③ 杜预:《春秋序》,载《春秋左传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本,第3705页。

④ 杜预:《春秋序》,载《春秋左传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本,第3700页。

⑤ 杜预:《春秋序》,载《春秋左传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本,第3699页。

⑥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69,《春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1页。

⑦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页。

⑧ 这只是总体而言,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如在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罢《春秋》学官及贡举的影响下,新《春秋》学便受到了阻碍。详见葛焕礼《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⑨ 整体研究的成果仅有俞樟华、林怡《宋代〈左传〉学概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和印宁波《宋代〈左传〉学三论》(四川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两文。前者以《左传》学中的一些经典命题为目,如《左传》的作者和编定年代、经传关系、《左传》史学性质等来考察,将宋人在《左传》学上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概述。后者主要围绕道统论、经学观、疑古等三个问题展开,认为宋代《左传》学的实质是在前人杂取三家的基础上,将道统论、心性论、史学等内容融合进来形成的治学体系。另外,方孝岳在《左传通论》中,钩稽出陈傅良、吕祖谦、程公说和黄泽等4位重要宋代《左传》学者,认为他们的《左传》学研究先采《左传》而后附采《公》《穀》及啖、赵以后之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0-33页。

系统性梳理与总结。^①笔者认为,要探求宋代《左传》学何以出现史学化的转向,必须要将其置于经、史二重路径下加以考察。是以本文试从经、史两个视角考察宋代《左传》学,旨在全面梳理宋代《左传》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成就与地位作出新的认识。

二、经学路径:疑经思潮下的宋代《左传》学

唐代兴起的疑经思潮入宋以后继续发展,至北宋庆历以后形成风气,到南宋末年仍长盛不衰。“疑经”的主要内容是怀疑前人公认的经书作者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理性等问题,范围涵盖十三经。疑经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经,而是对前人解经中的牵强附会予以破除,目的是通过完善经的合理性,以更好地尊经。疑经的“破”与发明经旨的“立”是不可分割的,宋代理学家通过反对前人的曲说,为重新注经扫除障碍。《左传》在宋代以前已经取得权威地位,直到唐中晚期才有所动摇。在宋代理学思潮背景下,宋人极为推崇《春秋》经。出于尊《春秋》经的需要,人们进一步对《左传》进行了“降格”。具体表现有以下数端:

一是质疑《左传》作者的身份。对于《左传》作者,赵匡已经质疑在前,而宋人的质疑已经比较普遍。刘敞就认为,《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并不是孔子的弟子,杜预所谓左丘明受经于孔子之说站不住脚。他说:

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之游,独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丘明,丘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②

既然左丘明并未受经于孔子,那么《左传》中的“义”,就与《春秋》大义无关。前代学者于《春秋》和《左传》之异,往往“舍经以就传”,这对于极为推崇《春秋》的宋人来说,是方法上的背道而驰,因而受到刘敞的猛烈批评。如《左传》记晋灭虞国后继续祭祀虞国祖先,并把虞国的供奉仍归于周天子,这是肯定晋国灭虞国的做法。对此刘敞说道:“虞、晋同姓,灭之,大罪也。虽其自欲文饰,修祀、归贡不足以掩其大恶,《春秋》曷为听之邪?灭人之国,废王者所封,绝先祖之体……左氏本不受经,不知其义,怪其文理异常,硬雕琢迁就为此尔。”^③刘敞视强晋灭弱虞是“大恶”,认为左氏之所以于“大义”上无知,乃因他并非受经于孔子。朱熹也指出《论语》中的“左丘明”姓“左丘”,与《左传》的作者不是同一人,《左传》作者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极详。”^④

由质疑左氏身份,宋人进一步认为《左传》作者当为战国时人。这一论断为今人所认可,是宋代《左传》学的一大贡献。据陈振孙言,宋人所作《左氏解》^⑤一书,即“专辨左氏为六国时人,其明验十有一事。”^⑥程颐也指出《左传》最早成书在战国晚期,其弟子记曰:“子言《左传》非丘明作。‘虞不腊矣’并‘庶长’皆秦官秦语。”^⑦“腊”指“腊祭”,“庶长”指秦国官名,由此程颐认为《左传》为战国晚期作品。朱熹亦认同这一观点,认为“秦始有腊祭,而《左传》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

① 沈玉宁在《春秋左传史稿》中,既从《春秋》经传的背景下考察《左传》学的新趋向,又从史学角度对《左传》研究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关注到把《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等多部史书情况。参见沈玉宁、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246页。张素卿、葛焕礼则关注到《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的关系,特别是宋代《左传》学对纪事本末体产生的重要作用。参见张素卿《〈左传〉研究:叙事与纪事本末》,“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1999年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葛焕礼《〈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文史哲》2017年第4期。

② 刘敞:《春秋权衡》卷1,《左氏第一》,载《儒藏》(精华编九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页。

③ 刘敞:《春秋权衡》卷4,《左氏第四》,载《儒藏》(精华编九〇),第332-333页。

④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83,《春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53页。

⑤ 该书为宋人所作,已佚。《宋史·艺文志》题为王安石所作,陈振孙作《解题》予以否认。

⑥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3,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页。

⑦ 程颐、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外书卷11,《时氏本拾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9页。

明”^①。叶梦得认为《左传》晚于《公》《穀》，理由是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条，《公》《穀》以日月例解说何以不书日，《左传》则书“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这是《左传》受《公》《穀》影响：“盖亦闻日月为例之说，故入春秋之初，欲窃而用之，后见其不可通，则止而不暇删也。”^②并明确认为左氏是战国周秦之间人氏，他说：“传初但记其为左氏而已，不言为丘明也……以左氏为丘明自司马迁失之也，唐赵氏虽疑之而不能必其说，今考其书杂见秦孝公以后事甚多，以予观之，殆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也。”^③语气似乎很肯定。

二是批评杜预发明的《左传》之“例”。以杜注为代表的解经体系，或出于尊《左》的家派需要，或出于解经的自圆其说，其中不乏牵强附会之处，宋人对此多有批评。首先是对“五十凡”的异见。刘敞在《春秋权衡》前七卷中，对《左传》和杜注的“例”有诸多批评。他认为《左传》中的所谓“例”在书中其他地方并不适用，这就不成为“例”了，如：“又云：‘如二君，故曰克。’春秋二君相伐多矣，皆曰伐，不曰克，不知何据而以为二君言克邪？”^④《左传》将庄公与叔段的战争比作两国君相争，庄公胜利了所以用“克”字，但刘敞指出二军相伐都是用“伐”，“克”字反而显得莫名其妙。刘敞进一步认为杜预着力阐发的“五十凡”，“是解旧史者也。仲尼修《春秋》而去之，以谓常事不足书也。”^⑤也就是说，“五十凡”只适宜用来理解《鲁春秋》，孔子在修《春秋》时已经尽去之，这无疑是对杜注釜底抽薪的攻击。今人赵伯雄指出，刘敞认为“五十凡”还有一部分是左丘明用来解经的^⑥，这与孔子之《春秋》大义都无涉。其次是对杜注“从赴告”说的质疑。《左传》学特别是杜注在解经中，往往强调《春秋》是鲁史旧文，在处理《左传》记事与《春秋》不同或传有经无的情况时，往往以“从赴告”来解释，刘敞对此总结道：“大率左氏解经之蔽有三：从赴告，一也；用旧史，二也；经阙文，三也。”^⑦刘敞并不否认“从赴告”的存在，但他认为以此来解《春秋》则消解了大义，《春秋》虽然出于旧史之文，但经过孔子笔削之后，其褒贬大义已与旧史的性质不同，《左传》与《春秋》相违之处，断不能以经就传。南宋《左传》学大家吕祖谦更进一步指出，杜注的“从赴告”说大约有一半是正解，并进一步区分了“鲁史之例”和“《春秋》之旨”，认为杜预的“从赴告”说解鲁史则可，解《春秋》则差矣：“杜预以从赴告解鲁史，则固然。若以赴告解《经》，则谬矣。杜氏止识鲁史之例，而圣人之意固不可知也。”^⑧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对“从赴告”说也颇为不满，针对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条，他认为其中是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美恶不嫌同词，突之书名，则本非有国，由祭仲立之也……凡此类抑扬其词，皆仲尼亲笔，非国史所能与，而先儒或以从赴告而书者，殊误矣。”^⑨

三是对《左传》不符义理之处的批评与改造。宋代理学将纲常伦理道德视为天理，据此对《左传》多有指责。朱熹对《左传》的批评便很有代表性，他说：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飧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穀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⑩

①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83，《春秋》，第2147页。

② 叶梦得：《春秋左传遗》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500页。

③ 叶梦得：《春秋考》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292页。

④ 刘敞：《春秋权衡》卷1，《左氏第一》，载《儒藏》（精华编九〇），第287页。

⑤ 刘敞：《春秋权衡》卷4，《左氏第四》，载《儒藏》（精华编九〇），第333页。

⑥ 赵伯雄：《春秋学史》，第329页。

⑦ 刘敞：《春秋权衡》卷7，《左氏第七》，载《儒藏》（精华编九〇），第400页。

⑧ 吕祖谦：《左氏传说》卷9，载《吕祖谦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⑨ 胡安国著，王丽梅校点：《春秋传》卷6，《桓公下》，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3页。

⑩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83，《春秋》，第2149、2149-2150、2151页。

朱熹不满《左传》以功利、成败论是非,并特别提到宋宣公立弟穆宗一事,认为《左传》从“其子辮之”的利禄角度考虑,相比于《穀梁传》以“居正”的正统之义来解说此事,是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吕祖谦也从义理角度总结了《左传》的三个缺点:

左氏生于春秋时,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此一病也。

又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夫礼义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专系于此?此二病也。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便无气象。此三病也。^①

这里所谓“三病”,其中第一病和第三病明显是从义理立论的,第一病“不明君臣大义”,自然严重违背了理学讲明义理的学术大旨;而第三病说《左传》津津乐道管仲、晏婴的事迹,说到孔子“便无气象”,旨在批评其具有明显的尊霸政治倾向。至于第二病“好以人事附会灾异”,这是宋人批评《左传》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北宋王皙就认为左氏“好以一时言貌之恭惰,与卜筮巫医之事,推定祸福,靡不有验,此其蔽也。”^②而这样的批评,也打上了时代理学的烙印。因为伴随着宋代理学思潮兴起后,传统天命观的神秘色彩大为减弱,天命具有了本体的价值和理性的意义,这种人事与灾异的简单附会自然不符合时代理学的天人观。

以上仅为宋人从经学视角评议《左传》之荦荦大者,实际上其对《左传》的解读远不止这些。总体上看,宋人说《春秋》,方法上通常兼采三传,再断以己意,因而《左传》叙事多被采用,而《左传》义例则多被批评。宋人“降格”《左传》的主要缘由,是其在唐代几乎与《春秋》相当的地位,这是尊经重义之宋人所无法容忍的。客观来说,宋人对《左传》本身和《左传》学义例的怀疑与反驳,具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它启发了后世关于《左传》文本、作者、成书等诸多问题的思考,破除了《左传》解读中诸多牵强附会之处,有益于《左传》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史学路径:对《左传》的史学解读

《左传》在传统学术的视域中,主要还是被视为经学。从历代正史目录学的分类来看,《左传》学著作往往被列于“《春秋》经”之下。从对经义阐发而言,宋人专注于《春秋》大义,对“传事不传义”的《左传》不很重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宋代学者重视对以“传事”为特色的《左传》进行史学解读,肯定其对于史学的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左传》的史学属性。《左传》作为史学属性,前人已有论及。司马迁最早将《左氏春秋》与《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并列,由此表明其史学性质。^③班彪将《左传》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并提,认为它们是“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④刘知幾《史通》将《左传》列为史体“六家”之一,是编年体史书的开山之作。^⑤然而,在汉唐学术史上,《左传》总体上还是被作为以史事解经的经学著作来看待的。到了宋代,《左传》的史学属性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

宋人认为,在经学史上视《左传》为古史始于唐中后期的新《春秋》学派。晁说之就说:“自啖、赵谓《公》、《穀》守经、《左氏》通史之后,学者待《左氏》如古史记,美文章纷华而玩之,不复语经于斯矣。”^⑥认为自从啖助、赵匡等人提出“《公》、《穀》守经、《左氏》通史”说之后,人们就不再以经学来看待《左传》了。此语说的有点绝对化,却也反映了人们关于《左传》史学属性认识的重要转变。胡宁虽然仍将《左传》视为解经著作,却肯定其“博通诸史”的史学属性更“有功于《春秋》”。他说:

① 吕祖谦:《左氏传说·纲领》,《吕祖谦全集》第7册,第6页。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6,《春秋皇纲论》,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5页。

③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9-510页。

④ 《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第1326-1327页。

⑤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

⑥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0,《春秋十三》,第3311页。

“左氏释经虽简,而博通诸史,叙事尤详,能令百世之下颇见本末,其有功于《春秋》为多。”^①实际上从北宋中期以后,已有不少学者将《左传》视作单纯的“古史记”,不再将其作为经来看待。如苏辙就认为,“凡《春秋》之事当从史。《左氏》史也。”^②原因在于“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③《春秋》与《左传》皆出自鲁史,因而其中的史事要以《左传》为本。郑樵亦有类似观点,他说:“按《春秋》之经则鲁史记也……左氏世为楚史,亲见官书,其讹差少,然有所讹从文起;《公》《穀》,汉之经生,惟是口传,其讹差多,然有所讹从音起。”^④郑樵肯定《春秋》出自鲁史,但不同于苏辙认为的左氏为鲁史,而认为左氏是楚史,由于“亲见官书”,因而《左传》中的讹误要比口传的《公》《穀》二传少。前已述及,朱熹也倾向于郑樵的看法,认为《左传》“载楚事极详。”黄仲炎在《春秋通说》的自序中也认为左氏是“倚相之后也”^⑤。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楚国历史在《左传》中的记述非常详细且重要的缘故而得出的。叶梦得还以《左传》与《春秋》作比,从史源学上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他在解说《左传》“八月纪人伐夷”条时说:

传例凡诸侯有告命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此以旧史言之可也。今言纪伐夷不告故不书者,以《春秋》言也,然《春秋》所据者旧史,旧史所据者赴告,旧史既以不告而不书矣,传何从得之?而复以经不书为说邪?以此知凡事有不见于经,如郑厉公之入晋、文公之出之类,皆旧史所无,有传盖参取诸国之书与杂家小说,相与共成之,不全出于旧史,故每兼见经外事多与经不合,而妄以经不书为义者皆非也。^⑥

认为《春秋》和《左传》固然都是来源于鲁之旧史,但《左传》还“参取诸国之书与杂家小说”,又“不全出于旧史”,隐含之意是其更具史学价值。同时指出因为史料来源有别,认为《春秋》与《左传》不合之事的书与不书是彰显微言大义的说法并不符合实情。

宋代编年体史书重焕生机,《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的源头之一,其发凡之功受到学者们关注。如前所述,刘知幾就将《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的代表。宋人刘恕评述道:

《左氏传》据鲁史,因诸侯国书,系年叙事。《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以免时难。后汉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依《左传》体为《汉纪》,言约事详,大行于世。^⑦

认为《左传》作为《春秋》之传,以系年叙事的编年体形式,记载了春秋时期诸多史事。而其编年系事“言约事详”的特点,成为荀悦改编《汉书》以成《汉纪》的依据。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也是“因丘明编年之体”^⑧以成其书。如果说刘知幾、刘恕等人在理论上肯定了《左传》的编年体价值,那么荀悦、司马光等人则是在具体史学实践中发展了《左传》编年叙事法。

二是重视对《左传》的史学改编。高士奇曾说:“自宋以来,学者以《左传》叙事隔涉年月,不得其统,往往为之詮次类编。其见于史志者,有杨均、叶清臣、宋敏修、黄颖、周武仲、句龙传、桂绩、吕祖谦、陈持、章冲、徐得之、孙调、杨泰之、毛友、徐安道、孔范等诸家。今其书多亡佚不传。”^⑨实际上这类改编在宋代《左传》学著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具体见下表^⑩:

① 胡宁:《胡氏传序》,载胡广等撰《春秋大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页。

② 苏辙:《春秋集解》卷1,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页。

③ 苏辙:《春秋集解》引,第1页。

④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6,《春秋十九》,第3401页。

⑤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90,《春秋二十三》,第3482页。

⑥ 叶梦得:《春秋左传谏》卷1,第499页。

⑦ 刘恕:《通鉴外纪》后序,载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105,《题跋》9,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2923页。

⑧ 刘恕:《通鉴外纪》后序,载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105,《题跋》9,第2924页。

⑨ 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卷30,《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92-993页。

⑩ 引自张尚英、舒大刚《宋代〈春秋〉学文献与宋代〈春秋〉学》,《求索》2007年第7期。

宋代《春秋》学著作分类表

	正文	传注	义例	考证类编	文字音义	辑佚	繁露	合计
左传	无	40	1	62	2	1	无	106
公羊	无	3	1	无	无	无	2	6
谷梁	无	3	1	无	无	无	无	4
总义	4	387	39	52	4	无	无	486
合计	4	433	42	114	6	1	2	602

从上表可以看出,宋代《左传》的考证类编在《左传》学各类著作中数量最多,超过了总义的考证类编数量;而《公》《穀》二传却没有相应的考证类编。这当然与《左传》记述史事丰富,从而易于被改编有关,更重要的还是该书受到了宋人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所记事件往往因年隔断,葛焕礼依据史志考证,认为这种对《左传》的改编最早始自晋代黄容的《左传抄》,到宋代这类改编明显增多。他将这类改编从体例上分为三类:一是分国类编,如宋敏修《春秋列国类纂》、周武仲《春秋左传编类》等;二是以人类编,如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郑昂《春秋臣传》等;三是直接类编,如叶清臣《春秋纂类》、桂绩《类左传》、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等。^①除此之外,还有将《左传》改编为纪传体,如无名氏《左氏纪传》;有改编为表体,如杨彦龄的《左氏春秋年表》、环中的《左氏二十国年表》等;有以《左传》中史事而发评论的史评体,如吕祖谦的《左氏博议》《左氏传说》等。此外,还有一些名为《春秋》的改编,实际上以《左传》为本,如冯继先的《春秋名号归一图》,“凡《左传》所载君臣名氏,字谥互见错出,故为此《图》以一之。”^②

在以上诸类改编中,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是现存最早的以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而成的著作。葛焕礼通过详细考证,认为纪事本末作为一种编纂体例,不是创始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而是袁枢借鉴了已有长久传统的《左传》纪事类编的编撰体例,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传统。^③ 谢澹在书序中也评述道:

《春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使君之法,事为主而年系之。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以年系事,而事为之全。二者不可一废。纪年也,故以事系而年全;纪事也,故以年系而事全。事系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系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④

认为《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将以事系年的编年体改编为“事为主而年系之”的纪事本末体,是对编年体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该书的改编史学色彩也非常浓厚。章冲在自序中说:

左氏之为邱明与受经于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艳,广记备言之工,学者掇其英精,会其离析,各备其事之本末,则所当尽心焉者。古今人用力于是书亦云多矣,而为之事类者,未之见也。冲因先生日阅以熟,乃得原始要终,摭摭推迁,各从其类。有当省文,颇多裁损。亦有裂句摘字联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约而不烦,一览尽见,又总记其灾异、力役之数,时君之政,战阵之法,与夫器物之名,并系于后。读之者不烦参考而毕陈于目前。^⑤

章冲将其撰述旨趣概括为“为之事类”,将《左传》所载二百四十年大小事件,以事为纲完整列出。四库馆臣认为该书“遂变经义为史裁,于笔削之文渺不相涉。”^⑥

① 葛焕礼:《〈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文史哲》2017年第4期。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③ 葛焕礼:《〈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文史哲》2017年第4期。

④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8,《春秋二十一》,第3441页。

⑤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8,《春秋二十一》,第3440-3441页。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9,《纪事本末类》,第437页。

史学改编使得《左传》更为通俗易懂、切合实用,成为宋代科举考试必读之书,吕祖谦的《左氏博议》堪为代表。该书为吕氏于乾道四年(1168年)为诸生课试所作,在学子中广为流传,“诸生岁时休沐,必抄寅褚中,解其归装无虚者。并舍姻党复从而广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①吕氏以《左传》教导举子如何作论,提出“先看主意,然后看过接处。论题若玩熟,当别立新意说。”^②《宋史·艺文志》还载有范冲《春秋左氏讲义》、时澜《左氏春秋讲义》两种。另一类改编则是作为童蒙教育读物。像李浹的《左氏广海蒙》、杨彦龄的《左氏蒙求》等,皆为此类著作。童蒙读物当然无法严格归为史学改编,但基于《左传》的童蒙读物改编,还是起到了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对《左传》的史学改编中,也有经学意味依然浓厚者。如徐得之的《春秋左氏国纪》,该书“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③褒贬意味就很浓厚。

三是肯定《左传》的史料价值。朱熹作为宋代义理史学的代表,却也肯定《左传》的史料价值。在说到如何读《左传》时,他说:

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威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僖之时,威文迭伯,政由诸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吴越又强入来争伯。定哀之时,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世,更没奈何。^④

在此朱熹将《左传》所反映的春秋十二公的历史发展大势加以简要勾勒,显然是基于史实作出的解说。吕祖谦进一步指出,看《左传》要从历史大势着眼:

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⑤

认为从历史的大处着眼,才能对《左传》一书形成深刻的理解。吕祖谦对如何看一代、一国、一君、一人进行了细致阐述,如认为所谓“一代之升降”,就是春秋之时乃是“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虽远,先王之流风遗制,典章文物,犹有存者,礼乐征伐,尚自天子出。”^⑥他对《左传》的纲领总结道:“盖此书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因,此所以最好看。”^⑦吕氏超越了具体的征伐礼乐之史事,着眼于历史发展大势,从这一角度肯定了《左传》一书的史料价值。

叙制度沿革是《左传》的重要内涵。叶梦得认为“礼”作为一种道德规定或制度,在《左传》的历史叙事中有充分体现。^⑧张大亨不满于杜预认为《左传》皆为周公礼典,取春秋时期事迹,分吉凶军宾嘉五礼,作《春秋五礼例宗》。魏了翁的《春秋左传要义》亦留心于《左传》中的典制,“名物度数之间,则删繁举要、本末燦然。盖左氏之书,详于典制。三代之文章礼乐,犹可以考见其大凡。”^⑨吕祖谦敏锐地指出,《左传》中既有周之旧典,又有春秋时之礼制,这是由于《左传》成书为鲁之旧史所不可避免的:

《左氏》所谓礼,非《左氏》自说,乃是周之典礼。盖夫子未笔削《春秋》时,鲁史本谓《鲁春秋》。《鲁春秋》之法,合于周礼者则书,不合于周礼者亦书,所以示劝戒也。故韩宣子适鲁,见

① 吕祖谦:《左氏博议》附录,载《吕祖谦全集》第6册,第575页。

② 魏天应:《论学绳尺》卷首,《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141页。

③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8,《春秋二十一》,第3446页。

④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83,《春秋》,第2148-2149页。

⑤ 吕祖谦:《左氏传说·看左氏规模》,载《吕祖谦全集》第7册,第1页。

⑥ 吕祖谦:《左氏传说·看左氏规模》,载《吕祖谦全集》第7册,第1页。

⑦ 吕祖谦:《左氏传说·纲领》,载《吕祖谦全集》第7册,第2页。

⑧ 永瑛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7,《春秋类二》,第218页。

⑨ 永瑛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7,《春秋类二》,第221页。

《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今《左氏》所谓“礼也”之类便是。然其中却又有两般：有周之旧典礼经，又有春秋当时之所谓礼……《左传》书礼处极多，要须编辑作一处看，方见得两般分明。古之周礼，非今《周礼》之书。今《周礼》之书，只可谓之《周官》。^①

他认为要区分周之典礼或春秋时礼，必须将《左传》中所有关于“礼”的记载集中起来进行考订，“方见得两般分明”。吕祖谦还根据《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的记载，肯定《左传》所记礼制具有变易性思维特点。^②

宋代学者将《左传》当作一部反映春秋时期的史书，不再如前代学者为解经义而深文周纳，这给《左传》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发展。在宋人看来，《左传》对宋代史书编撰有重要影响，它不但促进了这一时期编年体的发展，而且催生了纪事本末体之新史体。宋人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产生了一大批改编《左传》而成的新史著，从史学角度促进了宋代《左传》学的发展；宋人以史学的视角研究《左传》及春秋的历史，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考察典章制度沿革，不少见解都很有见地，推动了后人对于春秋历史的研究。

四、结语

从经学路径看宋人的《左传》学研究，可以发现人们往往以历史理性的眼光对《左传》作者及其身份提出诸多怀疑，否认左氏与孔子的亲密关系，进而动摇《左传》释经的权威地位。从经传关系而言，先宋时期《春秋》与《左传》记载不一致处多“强经以就传”^③，这种对《左传》的推崇和对《春秋》实际上的贬低，是宋人迫切需要改变的状况。从经传大义而言，杜预强调《春秋》为鲁之旧史，宋人则强调孔子笔削之大义，认为杜注“从赴告”的发明消解了《春秋》大义，当以《春秋》为准，《左传》凡不合《春秋》之处，都不是孔子本义，不符合《春秋》大义，因而也不足取。宋人将对伦理道德的重视渗透到《左传》学的研究中，以极度强化的伦理观念衡量经典中的事与人。朱熹批评左氏“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④；胡安国《春秋传》以“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⑤为宗旨，都契合了这种理学伦理道德的要求。在宋代理学思潮背景下，《左传》纪实、崇霸的记述特点，使得这一时期经学路径的《左传》学研究难以形成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宋人从经学视角对《左传》作者的怀疑，降低了该书作为经传的权威性，使得《左传》的史学属性开始得以强调。自北宋中期开始，已有不少学者只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对其史学特性和史学价值进行挖掘。宋代学者关注到《左传》对编年体史书的开创性价值，以及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宋人对《左传》进行的诸多类别的史学改编，不但出现了现存最早的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而成的著作，形成了成系列的《左传》改编著作，而且这类改编成为历史知识普及的重要载体。脱离了经学的桎梏，宋人从史学视角看待《左传》中的史事，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尽管人们的史学视角不尽相同，却都重视对《左传》进行史实考察，只是相比较而言，理学家更加偏重于求义，而史学家则更偏重于事理罢了。

宋代《左传》学研究的经史两种路径是存在着交融的。从经学的研究路径来看，宋代学者的《左传》研究，主要是针对宋代以前《左传》学的重要观点展开讨论。宋人关于《左传》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善于发挥，勇于立说，他们借解经发挥自己的政治、学术观点，往往不受约束，或直阐大义，或断以己意。然而，宋人出于立说的需要，就不得不重视对于《左传》的考订，其中就包含有很多史学因素，他们在破除家法、师法和经传体系的束缚后，经学的历史考证与史学的历史考证更为接近，开创了“以史明

① 吕祖谦：《左氏传说》卷2，《桓公》，载《吕祖谦全集》第7册，第35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年，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356-1357页。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6，《春秋左传正义》条，第210页。

④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83，《春秋》，第2150页。

⑤ 胡安国著，王丽梅校点：《春秋传》卷首《序》，第1页。

理”的方法路径。从史学研究路径来看,宋人普遍开始关注到《左传》作为一部优秀史书的价值,从历史编撰、历史思想、历史教育等角度加以阐发。在历史编纂上,宋代《左传》学不但对宋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产生了影响,还促成了后世各种《左传》类史书的问世,促进了编年体的不断创新,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然而在历史观上,宋代《左传》学研究大多还是以天理史观为指导,以伦理道德品评史事和人物,在推进《左传》史学阐发的同时,也不忘进行义理阐发。

宋代学者在不断批判与怀疑中促成宋代《左传》学发展的同时,也为后世《左传》研究开辟了路径,深深影响了后世《左传》学的发展走向。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对杜注的批评与立新。如明人陆粲、傅逊、凌稚隆、刘绩等人即是在宋人对杜注的批判与修正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汪克宽、赵汭、郝敬等人则在宋人讨论的基础上指出《左传》中的经文与史文的区分,不再以“例”和褒贬的框架来限制对于《左传》的解读。清人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对杜解的补充和纠正,开启了清代规补杜注之先声,其后姜炳璋《左传补义》、焦循《春秋左传补疏》、沈钦韩《左传补注》等书继之。二是为明清时期《左传》改编提供了范式。明人穆文熙《左传评苑》、陈禹谟《左氏兵略》、魏禧《左氏兵谋》皆是沿着宋人的路数对《左传》进行的不同类别的改编。清代考据学的日盛,涌现出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范士龄《左传释地》等佳作。三是对《左传》学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提供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如关于《左传》作者和成书时代这两大议题,近代以来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宋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得到了高度重视与认可。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The Two Paths of the Study of ZUOZHUAN in the Song Dynasty

Cheng Yuanyu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classical path and historical path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paths in the study of ZUOZHUAN in the So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kepticism about classics, scholars raised doubts about the identity of the author and formation era of the book; criticizing the “example” of Du Y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especially the ridiculous theory of “according to reporting”, the scholars reformed the parts which did not match to the Confucian teachings. This path lowered the status of the book in Confucian Classics, so it was valued as a historic book. Some scholars viewed the ZUOZHUAN as a historical book, affirming its influence as a model for the compilation of chronological historical book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adaptation of ZUOZHUAN promoted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scholars paid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value in the ZUOZHUAN, and examined the overall trend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skepticism and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ZUOZHUAN in the Song Dynasty provides new research path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status of the ZUOZHUAN in Classics, its historical value has been further explored.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the study of ZUOZHU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two paths

(责任编辑 汪高鑫)